

重庆工商史料选輯

第一輯

(内部发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合編

重庆工商史料选輯

第一輯

(内部发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合編

一九六二年七月

前　　言

1960年，我們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根據黨對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對於部份散居在社會上的老年工商業者，成立了學習座談會。與會人士由於解放以前經營工商企業的歷史較久，閱歷經驗比較豐富，對重慶工商情況相當熟悉。我們遵照全國政協周恩來主席号召各方面老年人士“把親身經歷記錄下來傳之後代”的精神，推動和幫助他們組織了“工商史料小組”，開展關於工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一年多來，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已經取得初步成績。現特選出部份史料，編成專輯，陸續出版，以供有關方面參考。

這項工作，是一項新的工作。它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組成部份，不僅具體地揭示我國民族資本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過程，為研究我國社會經濟及近代國民經濟史提供丰富可靠的材料和論據；同時，對於工商業者的自我教育與自我改造也具有促進作用。我們熱情地歡迎本市廣大工商業者多給我們提出寶貴的資料和意見，借以丰富“選輯”內容，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目 录

- 英人立德乐掠奪江北矿權紀要 唐白異 (1)
- 從“法商”聚福洋行到強華公司的經過
..... 黃瑾瑩 (20)
- 重庆銅元局的片斷回憶 傅友周 (44)
- 回憶四川水泥厂 宁芷邨 (55)
- 解放前的重庆电力公司 傅友周 (69)
- 我所知道的允丰正 卢灝康 (91)
- 桐君閣藥厂的今昔觀 陈席璋 (107)
- 重庆巨商湯子敬的发家史
..... 蔡鶴年、陳詩可、藍襄臣、劉開非、彭肇淮 (129)
- 我所經營的復興面粉厂 鮑伯良 (153)
- 經營“特業”五年述略 曾俊臣 (174)

英人立德乐掠奪江北礦權紀要

——江合煤矿(現江北煤矿)历史回憶之一

唐 白 異

前 言

四川省江北县(清朝江北厅)龙王硐地区的煤炭开采权，距今六十年前，曾一度为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所侵占。他违反中外条约，组织华英煤铁公司，深入内地设厂采煤，拓置矿区，强占土地，进行修筑铁路，以遂其贪得无厌之欲望。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外怯内压，不敢抗拒，竟致订立丧权辱国的合同，断送了江北县煤铁矿产。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弟兄，为了反抗侵略，保护路矿两权，起而激烈斗争；同时江北绅商筹组江合矿务公司，从业务经营方面抵制“华英”。这是一次反帝爱国的行动，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达到收回路矿两权的目的。江合矿务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虽在获得巨额利润，但是他们在这次行动中也表现了反帝爱国的一面，并为以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也是值得我们介绍出来的。

这次斗争，涉及所谓“开放”中国内地问题，当时外国新闻也详为报导，成为中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我的前辈亲属，从开始就参加了江合矿务公司的筹建工作，因此使我有机会从一些创办人的口

述中得知事实梗概。可惜的是有关档案文件，多数散失无存；尤其是农民弟兄坚决反抗筑路的爱国行动，当时缺乏文字記載；而亲身参与过这一斗争的人們又均已不在人間，目前进行訪問、搜集，也极为困难。这里仅就我过去耳聞和现在所能搜集到的一部分資料，經過回忆、对証，整理出来，以供有关方面的参考。

一 立德乐在宜渝两地的早期活动

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在第二次 鴉片 战爭 时期 即已来到中国，據說曾参加过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勾結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組織的“常胜軍”。他的妻子咀唇生須，但頗富有；立德乐和她結婚，发了妻財之后，轉而从事商业經營。他会說中国話，认识中国字，对中国社会情形頗為熟悉。他就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作为对我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資本。

昏瞶无能的清政府于1857年到1860年战敗于英法联軍，被迫議和，簽訂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沿海七省和长江沿岸都开辟了商埠，帝国主义势力从此直接侵入中国腹地。1876年中英締結的“烟台條約”，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开辟了通向我国西南各省的道路。按條約第三款规定：“开宜昌、蕪湖、溫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員駐寓查看……俟輪船能上驶后，再行議办。”野心勃勃的立德乐看中了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1883年2月便以游历内地为名，（实际上就是来渝进行查看），由上海搭輪到汉口后，由于枯水季节停航，（当时汉宜間的輪船只在洪水季节行驶）改乘木船，經過40天的水上旅行到达重庆。他在重庆虽只“駐寓”了一个短暫的时间，但“查看”結果却很感滿意。后来他根据这次游历的日記，写成《經過扬子江三峡游記》，

对我国极尽诬蔑侮辱之能事，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阴谋活动和野心。

他在《游記》第一章里一开始就說：“从东印度公司时代起直到目前，英国和中国交通的历史，不过是为了开辟和发展貿易而不断斗争的一个記載……”，他对当时中英貿易的发展甚表不滿，認為应当扩大十倍，才能适合口味。他說阻碍中英貿易发展的原因三个：①中国各地交通設备过于粗陋，增加了洋貨运入内地的成本；②頑固保守的清朝政府阻止商民采用外国新法开办工矿企业，使外商无法投資；③内地关卡林立，妨碍了洋貨的暢銷。因此他主张要尽量发展长江航运，首先应使輪船直达重庆，并多辟通商口岸，多設海关，撤除内地关卡等等。要怎样才能达到上述企图，他在第一章結束时写道：“我們能够督促而且应当迫使中国官吏忠实履行中英各項條約所规定的义务，以发展中英貿易；同时对中国中央政府反抗我們的欧洲競爭者（指法、俄、德等国）要求优先权利时，我們应当使他們信賴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所給予的支持。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以坚强的压力，来对付中国人长期拖延的泄气影响；他們是运用拖延艺术的老手，我們对施加压力既要有耐心，又要不停歇。”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的丑恶脸咀，和他在我国西南进行二十多年侵略活动所一貫使用的恶毒手段。

立德乐在四川游历之后，不久即在宜昌开設立德洋行，經營进出口貨物和报关业务。这不过是对他企图侵略我国西南的一个准备，他的主要目的，是要輪船行驶川江，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将“烟台條約”由文字“变为事实”（他在游記中如此說），俾使帝国主义势力得以深入内地。

1889年，他与人合资在苏格兰一家造船厂订造一艘命名为“固陵”的轮船，作为试航宜渝的第一只商轮，这只船载重量约500吨，是在上海装配的。固陵轮开到宜昌之后，湖北尤其是四川的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坚决反对行驶川江航线，迫使两省总督都打电报给北京的总理衙门请求向英国公使交涉制止；否则民情激昂，万一酿成事变，地方官吏碍难负责。同时宜昌的官厅也提出避免碰沉木船等问题，派员与立德乐直接进行谈判。经过半年之久，最后立德乐不得不停止航行，固陵由招商局以二十余万两的高价收購，改走宜汉航线。事后立德乐还怪当时的英国政府和驻北京的英公使，没有尽力支持他，对清王朝也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1890年3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續增专款六条，其中明确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1891年重庆正式设立海关后，立德乐的立德洋行也就在重庆正式设立，除了经营一般的进出口货物外，还兼营猪鬃和收購鸡毛等业务，营业逐步兴旺，获利日渐丰厚。但立德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看见宜汉轮船航运，有利可图，而在枯水季节，较大的轮船又均停航，于是他便又订造了一只载重200吨的小火轮，定名“彝陵”，行驶于宜汉之间，在枯水季节也能航行无阻，因而获利颇丰。但不久，下游三公司（招商、太古、怡和）开辟冬季行驶宜汉航线，彝陵轮因各种条件较差，竞争失败，被迫停航。这对立德乐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小小的打击，可是他并未因此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千方百计地策划推行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最为念念不忘的，仍是企图轮船上驶川江，使英帝国主义的魔爪深入西南。一个前任英国驻渝领事说过：“重庆开埠之后将成为华西的上海”，但在立德乐看来，“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毫无作用”。

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之议，甚嚣尘上，各自划定势力范围，由酝酿逐渐达到互相默认阶段。英帝国主义企图以长江流域为界，视重庆为其囊中之物，而日本依照“马关条约”，已在重庆王家沱设立租界。英帝国主义见此情景，为了垄断川江轮船航运，做到捷足先登，因此当立德乐准备订造轮船再度试航川江，前往北京征求英公使意见时，英公使竇纳乐自然竭力支持。立德乐抓到这个机会，就在上海订造一只带有两个螺旋桨的小轮船，定名“利川”。这只船长55呎，宽10呎，麻栗木外壳，速度每小时九浬。1898年2月初旬，利川到了宜昌，准备上驶重庆，宜昌地方官厅派员上船洽商有关航行安全事项，立德乐因有英公使给他撑腰，竟采取强硬态度，拒绝进行商谈；并横蛮地通知当地官吏说：“无论你们同意与否，本轮决定于二月十五日开头。”这样利川轮按期开出，经过21天时间便到达了重庆。

立德乐自计划实现之后，更加趾高气扬，狂妄自大，在《游记》第三版序言中写道：“……过去由于英国政府迁就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坏方面，我试图开办川江轮船航运的计划，遭到挫折。现在感谢日本下了决心，打败中国（指甲午中日战争），又感谢英国政府改变政策，委派了一位能干的公使竇纳乐，因此一只开航先锋的轮船，才有可能上驶重庆……。”在该书附录“论英国势力范围”短文中，他更认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应当包括十一个省区。因为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占各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而这个范围仅占中国本部的五分之二。并主张英国应当及时趁火打劫，将所划势力范围加以实际占领，否则不久的将来，将会受到排挤，而英国人在华苦心掠夺来的权利，也将被迫转让他人。

利川轮试航的目的，是利用枯水季节，探查川江航道。试航

成功，証明了宜渝行輪的可能性，更增强了立德乐的侵略野心。于是他又在上海訂造了另一只正规的“肇通”商輪，于1900年夏初下水，乘洪水季节由宜昌上駛，由于有了上次航行的經驗，所以能够安全到达重庆。这是外国商輪行驶宜渝航線获得成功的第一只船。从此三峡門戶大开，帝国主义的兵艦、商輪，在川江橫行无阻，直到全国解放，这些侵略勢力，才随着帝国主义一起滾出中国。

当肇通輪到达重庆之时，正值北方各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进入高潮，八国联軍疯狂地向天津、北京进犯。英帝国主义从重庆撤退侨民，肇通輪即被英政府“封差”，改为“金沙江”兵艦，作为撤僑之用。此后，即未航行重庆。而侵夺川江航行权的急先鋒立德乐，也轉向四川内地的煤鐵矿方面进行新的掠夺了。

二 立德乐掠夺龙王硐煤矿开采权的經過

江北厅东西两山俱产煤鐵，而煤矿的儲藏量更为丰富。多年以来，西山的文星场，东山的龙王硐，煤窑群集，成为一个煤业极为发达的区域。

东山煤田在龙王硐一带，断层迭见，露头特多，便于土法开采。在清朝末年，当地主要的土煤窑只有五个：林春煊經營的大荒窑；罗純嘏和李金廷伙办的铁矿沟；李姓經營的单硐；簡家經營的干龙硐和李家經營的李家山。李家山煤业为其族人共有，因家族糾紛，在窑内按照“磚头”（采矿面积）分为两厂經營，另立名为洪福厂，故有五窑六厂之称。他們除了在营业上互相竞争外，在坑道方面亦常发生糾葛。五窑的坑道，大体上均系由南向北，平行进展，彼此之間的間隔不远，常有互相挖通之处，因此常常发生争夺“磚头”的糾紛，而尤以大荒窑和铁矿沟两窑之間的冲突更为激烈。除了械斗

外，还在坑道內堵塞风道，或燃烧辣椒、硫磺等物，熏烟对方工人酿成伤亡事故，在官厅相互控告，纠缠不已。铁矿沟的老板罗纯嘏，是当地一个颇有势力的地主，又是耶苏教徒，背后有美籍教士绿依士为之撑腰。大荒窑的老板林春煊惧势不敌，也勾结教徒王子范为后盾，并将大荒窑租与王子范经营，以求得保生存。由于双方均有教会庇护，官厅对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也就无能解决。

龙王硐的煤矿，立德乐觊觎已久，大荒窑和铁矿沟两厂的纠纷，正为他造成了插足的大好机会。投靠英国教会为护身符的王子范，原系重庆商界中人，因为教友关系常与立德乐接触，这样立德乐便一面以高价收买作引诱，一面凭借外国势力以相胁迫，于是王子范被逼首先将所租大荒窑顶卖与立德乐。铁矿沟和其他各厂的老板们，既贪图高价，又畏惧洋人，也乐于出售。这些毫无国家观念，见利忘义，丧心病狂的老板们，就开门揖盗，葬送了五窑六厂的开采权。

立德乐利用教徒、奸商，施展其威胁、利诱的手段，掠夺了龙王硐五窑六厂之后，打起“华英煤铁公司”的招牌，号称资本40万两，开始从事开采，进行垄断、压榨、剥削，并在附近强购土地房屋等，如1902年在龙王硐后山顶上，以高价2,100两向普照寺僧正仕购置田土、房屋、岩矿、码头。但龙王硐并非通商口岸，依照国际惯例和中外条约，外国商人不能在内地购地置产。立德乐违反条约的行动，激起了人民大众的反对，江北厅丞慑于威力不敢过问，只将引狼入室的教徒王子范加以拘罰（据说当场打了四十个板子）。但这就给英帝国主义一个另生枝节的机会。英国教会和英领事便借口出面干涉，事情闹大了，地方官吏不得不逐级上报，请示北京的清朝政府处理。于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就成为

一次外交事件的中心人物。

清王朝的总理衙門，向來由少數親貴把持。當時新設立的外務部總理大臣奕劻、會辦大臣邢桐，就是這類人物。他們對外搖尾乞憐，賣國求存，對內欺騙壓迫，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他們雖然一面懂得，立德樂深入內地，大肆收買煤窯、礦地的行為，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從“馬關條約”所取得的權利。馬關條約規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意從事各種工藝製造。這是清朝於甲午戰敗之後，被迫第一次正式允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龍王硐並非通商口岸，如果立德樂在內地購產設廠的惡例一開，影響所及，勢將在全國造成內地開放的局面，封建統治將進一步崩潰，這是最可怕的事情。但一向怯外壓內的清政府不敢據理力爭，既要滿足立德樂的要求，又不願在表面上開外人在內地隨便購地設廠之例，因而挖空心思，想出一個“兩全其美”之道，要立德樂將華英煤鐵公司改為中英合辦，並將立德樂自行購置的五窯六廠和其他礦地、礦窯，改為官辦的“保富公司”代英商購買所需礦地、礦窯，再轉租與華英煤鐵公司，按照年限开办，借以欺騙人民。這個保富公司實際是個空架子，除了與華英訂立合同和租約外，不起任何作用。這時，老奸巨猾的立德樂更得寸進步，提出要江北廳全境煤鐵各礦的開採權。清政府也只好將錯就錯，於1904年（光緒30年）12月，經外務部“奏明奉旨允准”之後，由四川礦務總局和保富公司與立德樂的華英煤鐵公司訂立合同十六條。其所給華英的權利異常廣泛，不僅使立德樂把掠奪來的龍王硐煤炭的開採權成為合法化，而且擴大及於江北全境的礦藏，其範圍遠遠超過了五窯六廠，概括起來有如下三項：

（1）在江北境內，由華英煤鐵公司查勘指定礦地一處，面積以

三十平方华里为限。倘此一处办无成效，可将此无用之地归还保富公司，准华英煤鐵公司再行另指一处开办；如有成效（以繳清出井稅及地租稅，即为有成效），亦可推广别处，繼續开采。但在未指定之先，除中国自办外，其他外国公司及华洋合办公司均不准前往开采（第一条及第五条前段）。

（2）自批定合同之日起，准华英煤鐵公司在划定地区内开采煤矿，年限以五十年为限，其他外国公司及华洋合办煤鐵公司，不得在江北厅境内开采。限期滿后，矿务兴旺，可展限十五年（第十条）。

（3）在矿厂之外，修筑路道，范围无限制。修建轉运小鐵道，由龙王廟至最近水口（獅子口）路长四十余华里；新开小运河及凿深旧小河，地区不加限定（第十二条）。

腐朽昏庸的清朝官吏，断送这些权利，冀图达到的目的：一、在名义上华英合办煤鐵公司；二、将英商在内地自行購置的煤窑、矿地，在形式上改由保富公司代購，轉租与英商开采。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合同第二条规定：华英公司內应派华英总办各一人……公司內工程、事务由英总办专理。經收租稅等事，由华总办經理。并須派华官一員在开矿之地稽查及管理地方交涉事宜。华員薪金，在公司支給。第三条规定：保富公司应行聚集足够股本，以为購买华英煤鐵公司所需矿地、矿窑之用，……轉租与华英煤鐵公司，依年限开办。第七条规定：开办各矿，如因无利停办，或有利已取，即將无用之地，退归保富公司，以作別用，与华英煤鐵公司无涉。

从以上这些条文的规定，完全可以看出，公司一切生产管理、业务經營等重要事項，悉由总办立德乐大权独揽，华总办和所派华官，实际上就是立德乐雇用的买办，同时，华英煤鐵公司需要多少

矿地、矿窑，保富公司就得垫款替它购置租用，而且无用之地，还要保富公司负责掉换。这个恶例一开，使任何外国商人都会援例提出要求，到内地各处办厂开矿。因此，这个合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合同；保富公司是一个十足为侵略者服务的工具，难怪乎合同一经订立之后，就遭到川东各界人民更强烈的反对。

三 收回路、矿两权的斗争

(一) 川东人民一致反对侵略者

立德乐以奸猾手段掠夺龙王硐煤矿的开采权，从开始就遭到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立德乐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并不因人民的反对而有所顾忌，而且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又进一步以操纵居奇的伎俩抬高“龙煤”的售价。

五窑六厂未被英商侵占之前，每月总产量已达三千吨左右，除少部分供应附近各乡镇居民生活用煤外，其余大部分均运往外地作为工业用煤或供应特殊用途。早已驰名的“龙煤”，由于具有灰分少、含硫低、起火快、火力大、火焰长等优点，在川东各地的工业用煤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重庆铜元局、烛川电灯公司等，均需用龙王硐的块煤作锅炉燃料；江津等地的锅厂铸造盐锅、鼎锅、铁罐等，也需用龙王硐的炭（用粒煤或块煤，以简单方法炼成的炭）；各地铁铺制造精良刀剪、鎌刀、钢锯等，也多争相购用龙煤作为锻铸燃料。重庆及其他附近城镇的炭号，亦经常派人驻在龙王硐就地收購，租地堆存，陆续“发旱力”（临时雇用农民）肩挑出河，装船转运以应市场需要。

立德乐据据五窑六厂之后，所产煤炭，除末煤外，其余粒煤、块煤等即停止就广出售，全部自行发旱力运出河口，转运重庆和下游

各地銷售，主要對象是當時行駛川江和宜昌以下的各國兵艦或商輪。為了開辟銷路和供應便利，除在獅子口購買地皮，新辟碼頭，修建大規模的煤坪房屋，以備儲存煤炭外，并在重慶、涪陵、万县、夔府、宜昌等地設置煤坪，以便各國兵艦、商輪沿途加煤。這些艦輪行駛急流險灘，既須使用優良煤炭，又需沿途上煤，以減輕載煤噸量，均愿出高價購買為立德樂壟斷操縱的“龍煤”，每噸價格竟達30余兩之巨。這樣昂貴的售價，迫使那些向來需用“龍煤”的工業和用戶，均不敢問津，因而歇業或倒閉者甚多。至于依靠轉賣“龍煤”的商販們，也因無貨購買而不得不关门。

川東各地人民，鑑於英商的任意侵入內地，巧取豪奪，如果任其所為，后患將不堪設想，於是紛紛向官廳控訴，請求依照中外條約，據理力爭，收回矿权。但是腐朽無能的清朝政府，與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不但不作收回矿权之舉，反而與英商訂立賣國合同，擴大其侵略範圍，使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進一步得逞，於是群情憤激，輿論譁然，各界人民憤起反對。江北紳商，以桑梓所在，利權不容外溢，因而合力集資組織煤矿公司，以與英商抗衡；根據保富公司與華英公司所訂合同第五條中“……所指之地，如現有華商开办，該公司不必重指”的規定，拟在盛產煤鐵的江北東西兩山，將英商尚未指索開采的矿地先行備价收買，以此制止英商的繼續擴展。經過積極籌備，1905年四川第一個官督商辦煤矿——江合礦務公司開始成立了。

（二）江合礦務公司的成立及其早期業務活動

川東各地人民反帝愛國的巨浪，迫使四川地方官吏知所戒惧。他們一方面深恐民憤難平，釀成重大外交事件，難于收拾；另一方

面，对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得陇望蜀，侵夺无已，亦感穷于应付；加以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看见立德乐掠夺中国内地矿权，由小而大，如入无人之境，亦纷纷借名“游历”，到川东各地寻觅矿苗，企图择肥而噬，也使地方官吏深感不安。据不完全的资料，继立德乐之后，发展为具体行动的有以下三起：

(1) 北碚温泉有白洋人开办煤窑，并在温泉庙后修建小型土高炉试行冶铁失败。当地人民曾流传这样一个歌谣：“白洋人生得恶，开个窑子庙角角，白天扯菩萨，夜晚扯秤砣”。

(2) 重庆南岸真武山有美国人开办煤窑，后由巴县士紳文庆之、傅渭卿等组织“四合公司”相抵制，美商始退出。

(3) 云阳县境内有外国商人进行掠夺煤矿开采权，后因当地人民坚决反对而停止。

此外，立德乐还在北碚二岩向周姓租佃醉房湾煤窑，交押租三百两，未及开办，由于当地人民坚决反对，周姓被迫退押，取消租约。

从上述事件中，地方官吏逐渐认识到北京政府与立德乐的华英煤铁公司所签订的卖国合同，已铸成大错，如不设法挽救，其祸蔓延，将无止境；而龙王硐煤矿，条件优越，立德乐霸占经营不久，即获厚利，欲其自动废止合同，交还矿权，不啻与虎谋皮。江北紳商筹设江合矿务公司，以亡羊补牢的办法，在合同范围内与华英进行斗争，这就被当时官吏们利用为解决困难的一个对策。因为那些殷实紳商，既能筹集资金，又易于掌握控制，利用他们出面与英商交涉对抗，成则官员们可以居功邀赏，败则诿诸“奸民貪利”，予以法办，以谢外人，即无事不了。因此，各级官吏，均暗中给予江合以支持，这是江合公司得以顺利筹设的主要原因之一。

江合煤矿在筹办时，以江北厅境内有嘉陵、泰洪两江，因而取

名“嘉泰”。报請四川督署立案时，官吏們認為江北境內的矿藏虽然丰富，而合川地区亦为富饒，必須把两地一并包括在內，方能杜絕洋商的覬覦，因此由劝业道改名为“江合”。

江合在立案之时，仅仅收到股金四万两，当然不能与宣称資本四十万两的华英相抗衡。于是江北厅邀集江巴两县知名紳商筹商集資办法，川东道及重庆府均派人参加，企图为江合筹集足够資金，以备于适当时机，贖回路矿两权。出席紳商以筹款困难，建議由保富公司出資四十万两收回龙王硐路矿两权自办。可是空架子的保富公司既无家底，又是代表官方，如果出面收回，帝国主义分子可能借口要挟，官府不好应付。这个建議沒有得到采納。官商同床异夢，于是互相推諉，形成僵局。几經折衷，才商議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办法，即：請由川汉铁路公司投資十万两，江巴士紳集資十万两，川东各县紳商集資二十万两。同时考慮到各县紳商集款需时，先向川汉铁路公司息借十万两支用，在每年开办捐輸时拏收归还，十年完清。这个办法分头由江北厅及川东道进行。后来川汉铁路公司以性質不同，不能投資及不便借款为辞，回答了江北厅。川东道行文到各州县向紳商劝募，除了大竹、渠县等地少数应募，另星交納，總額不到二百两外，其他各州县均落了空，而且这些另星交納股款的，也認為是对官方的一种捐輸，和应付场面的事。

江合在初办时期，是官督商办性質，虽然当时立案的章程文件等，现已无从查考，但在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为轉請批准江合試办章程，給北京农工商部的咨文中，对江合立案的經過有如下一段，就可以窺其梗概。

“……該厅（江北厅）紳民忧于桑梓之地，利权操之外人，不惟抵制无从，亦恐更遺后患。是以協謀合力，僉欲招集巨資，先將英